

一部日常生活視角下的民國 北京城市史著作

——評 Madeleine Yue Dong, *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

● 胡悦晗

《民國北京》通過考察民國時期北京城市變遷過程中的居民日常生活，重新審視「傳統」向「現代」的變遷過程，並試圖提煉出涵括民國時期北京城市風貌的典型特徵。



Madeleine Yue Dong, *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如何以更深入的問題意識整合不斷趨於「碎化」的城市史研究，使之避免淪為區域社會文化史的註

腳，是當下城市史研究面臨的瓶頸之一。北京因被西方學者視為最具中國特色的城市，開始在晚近的城市史研究中重新被「發現」。華盛頓大學董玥教授2003年在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民國北京：城市與歷史》(*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以下簡稱《民國北京》，引用只註頁碼)值得關注，該書是學術界第一本有關民國時期北京的通史^①。作者敏銳地捕捉到近三十年來北京的城市轉型對居民日常生活的影響，進而質疑這種以打造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為目標的城市轉型，是否以犧牲居民所習慣的生活方式為代價，以及居民的利益是否得到了應有的維護。帶着現實關懷，作者回溯歷史，通過考察民國時期北京城市變遷過程中的居民日常生活，重新審視「傳統」向「現代」的變遷過程，並試圖提煉出涵括民國時期北京城市風貌的典型特徵。

如作者所言，該書希望通過探究北京居民身處政治、社會與文化

轉型時期採取的應對方式，揭示物質生活與文化認同之間的動態關係，將民國北京的歷史從線性史觀中解放出來（〈前言〉，頁12）。筆者擬從該書的研究主題、論述框架、研究路徑與資料運用等方面展開述評。

一 研究主題：「回收」與「懷舊」

美國社會史和文化史泰斗伯克（Peter Burke）在有關早期歐洲民間文化的研究中通過考察平民、貴族、僧侶等階層共同參與狂歡的嘉年華會，指出歐洲的民間文化並不僅局限於下層人民，上層貴族也積極參與其中^②。其研究告訴我們，不同階層在文化、社會身份等方面

的邊界並非涇渭分明，而是相互之間存在着滲透與影響。董玥在《民國北京》中關於天橋的分析與伯克有異曲同工之妙。1920至1930年代，北京居民最熱衷的日常活動之一便是「逛天橋」，天橋吸引人之處在於冒險的交易活動與個體化的娛樂表演。散落在城市各個角落的二手物品被收集起來，在天橋重新加工並交易；而天橋的攤主則以欺詐顧客著稱，買賣雙方必須保持高度的精明和警惕才能從對方身上獲取最大利益。這樣的購物因討價還價的存在而變得有趣和刺激，逛天橋成爲一種逃離乏味的家庭日常生活的刺激和冒險（頁183）。

在天橋這個空間裏，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並不能保證其獲得誠信交易，每個人都有可能被欺騙。這種交易行爲模糊了既定的社會身份與

董玥筆下的天橋處於北京的生產體系與消費場所兩者的交叉點，並以其混亂和無序散發出獨特的魅力，通過上至昂貴奢侈品下至破爛條紋布的「回收」過程，將按等級與身份相區分的城市居民融爲一體。



北京因被西方學者視爲最具中國特色的城市，開始在晚近的城市史研究中重新被「發現」。

北京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回收」過程與其「懷舊」的城市記憶息息相關。他們始終徘徊在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狀態中，用懷舊的方式將被現代化進程擊碎的傳統殘片滲透在日常生活中。

階層，而其交易活動體現的實質也同國家層面的宣傳教化相衝突。如果說現代公民責任是宣導個人對國家的絕對服從以及整齊劃一的社會秩序，那麼天橋上呈現的行為規範則恰恰相反：它需要自私自利，以及時時刻刻警惕他人有可能給自己帶來的利益侵害（頁192）。可見，天橋與嘉年華會都是一個有別於秩序化與規範化的日常生活的異度空間。在這個空間裏，社會秩序與行為規範被暫時顛覆，狂歡與越界成為默許。董玥筆下的天橋處於北京的生產體系與消費場所兩者的交叉點，並以其混亂和無序散發出獨特的魅力，通過上至昂貴奢侈品下至破爛條紋布的「回收」過程，將按等級與身份相區分的城市居民融為一體。

葛兆光在論及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係時指出，傳統並不是一個「歷史」，而是一個「現實」，它只是被後來人的語言、願望、觀念加上現實的需要，在歷史中間尋找資源，一點一點建構起來的東西^③。在董玥看來，天橋上的「回收」過程不僅展示出城市居民個體的生活經驗，並且創造了民國北京城市文化的核心特徵。民國時期北京城經歷的戰亂與長期貧困迫使居民只關注眼前最根本的生存利益需要，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沒有拋棄過去，而是將過去當作一種可供利用的資源（頁307）。在董玥的筆下，「回收」概念並非指簡單回到過去，而是對過去的重新利用並創造新價值。「傳統」作為殘破的碎片存在於民國北京居民每天的日常生活中，「現

代」作為一個遙不可及的模糊方案尚未到來，而「回收」作為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過渡狀態，模糊了二者的邊界，存在於當下。

與以往中國城市史研究通常將北京與上海互為參照進行比較不同，董玥將民國時期的北京與十九世紀的巴黎相比較。在作者看來，北京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回收」過程與其「懷舊」的城市記憶息息相關。十八、十九世紀的巴黎處在工業化進程之中，尚未完全現代化。然而，大多數巴黎居民認為他們已經遠離過去，身處現代化的世界，並為之歡欣鼓舞。而民國北京的城市居民則始終徘徊在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狀態中，他們一面用懷舊的方式將被現代化進程擊碎的傳統殘片滲透在日常生活中，一面為這些殘留終將被未來的時代發展抹平而惴惴不安。「懷舊」代表着一種價值論，其親和性在於懷舊主體對某種情調、感受、氛圍和價值觀的認同。人們習慣於在日常經驗的層面上懷舊，注重那些觸發我們懷舊情思的生活細節^④。北京的老派學者與普通居民聚焦於被民族國家與新知識份子摒棄的北京歷史，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回收」體驗代表了中國現代性的精髓（頁303）。

二 論述框架：北京的都市轉型、生活經驗與城市記憶

《民國北京》全書共有八章，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第一至三章

考察民國時期政府如何基於不同的理念改造北京的城市空間，進而在日常生活層面考察這種改造引發的民眾對於國家權威的抵觸以及二者之間的互動較量；第二部分第四至第六章考察民國北京的生產體系與消費場所的變化，進而聚焦天橋，探究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經驗；第三部分第七至第九章考察民國時期北京的社會學家、地方知識份子與新知識份子三個群體在日常生活層面關於北京的城市記憶。

作者在第一部分指出，民國時期北京的城市轉型以1928年為界，經歷了兩個階段。民初，北京開始採取向現代文明城市轉變的市政管理與空間規劃的新舉措，與帝都時代劃清界限。政府不斷通過拓寬道路、開闢公園、廣場等方式增加城市的公共空間，將民眾置於政府的監視之下，規範居民在公共空間的行為舉止，以提高民眾素質水平，與現代文明市民相匹配。1928年後的北京則重新建構城市的過去，並將其服從於構建現代民族國家歷史的需要。國民政府用「發現傳統」的方式讓北京成為民族國家的「文化中心」象徵（頁101）。

然而，政府對城市空間的改造措施並非一帆風順，有些博弈註定以一方的失敗收場。政府的許多方案舉措遭到有固定謀生方式的居民的強烈抵制。在政府與居民的博弈中，資訊不對等限制了居民博弈的能力，城市轉型是以侵害市民與商人等的利益為代價；也有一些博弈以政府與民眾雙方的妥協告終。民國以降，政府給北京城的大小胡同

加以命名，目的在於確定在地圖上可以識別的方位。但政府無法控制居民對他們自己的胡同名稱的偏愛，許多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仍堅持使用原來的胡同名稱（頁75）。此外，民眾也用消極的方式對待政府對特定城市空間的形塑。1928年後執政的國民政府通過建造革命紀念碑這一儀式化的公共空間，形塑自身政權合法性與正當性的歷史象徵，但北京的革命紀念碑向來為本地居民與外地遊客所忽略，它們也很少在關於北京的文學作品中被提及。

作者在第二部分指出，民國北京存在現代全球工業經濟體系和前工業化的手工業與二手商品交易兩種經濟體系。現代全球工業經濟體系僅僅將北京看作商品市場，並未給予其生產性發展提供幫助；手工業與二手商品交易體系服務於北京人口大多數，在形塑民國北京的經濟生活及城市的文化認同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頁106）。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北方銀行紛紛將其總部及大量資金移往南方，北京未能健全完善的現代工業經濟體系，失去了作為東北、華北及蒙古地區三者之間貿易集散地的位置，經濟情況整體惡化，但手工業卻得到空前發展。

隨着生產結構的變化，北京城的消費場所也開始變得立體而多元。由新型專賣店、商場等組成的王府井與西單開始取代前門與大柵欄，成為北京新式消費場所的象徵。這些新式消費場所把顧客的價值建立在他們的購買力上，讓顧客相信社會地位可以由其參與現代消

隨着生產結構的變化，新式消費場所把顧客的價值建立在他們的購買力上，傳統意義上的廟會、集市、二手市場則日益延伸到城市的各個角落和縫隙之中，轉向服務於大多數中下層居民。

作者一方面深入北京普通居民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另一方面又將地方政府、新老知識份子納入研究範圍，展示出知識份子、個體攤販、雜耍藝人等三教九流共同生活其中的城市圖景。

費的能力表現出來。至於那些傳統意義上的廟會、集市、二手市場此時則日益延伸到城市的各個角落和縫隙之中，轉向服務於大多數中下層居民，滿足大量窮人的需要。

此外，現代娛樂業的投資者與傳統個人技藝表演者也在天橋展開競爭。新型投資者在天橋周邊建立了新世界百貨和城南公園。傳統的職業表演者則以設定准入門檻、控制成員的職業資格等方式建立並維持自身的組織。儘管這些現代娛樂業最初引起了北京市民的興趣，但卻未能維持下去，原因在於它們所定位的消費者群體事實上並不存在。北京的大多數居民每天工作時間長，幾乎沒有閒暇的時間與經濟能力頻繁光顧新式娛樂活動。

作者在第三部分指出，1920至1930年代，社會學家把北京看作「貧窮」、「賣淫」與「犯罪」的象徵（頁214）。一部分人把「貧窮」看作北京最重要的問題，並將其產生的原因歸咎於窮人懶散、不具備工作技能等道德缺陷與社會體制問題；另一部分人則認為北京現代工業的缺失使其未能為居民提供充分的就業機會。儘管觀點有所不同，但他們一致認為北京城的整體社會環境必須得到改變。他們宣導一個由強有力的政府執行的整體解決方案，希望國家能夠變得更有效率，更為強大。但他們無法為「社會」提供一個準確的定義，他們希望看到的理想政府與社會的模式在中國並不存在，而所做的調查和解讀也與中國社會實際有相當的距離。

在此期間，在北京各教育機構任職或就讀的來自南方的知識份子成為北京的新知識份子。從民初至1920年代中期，他們多以西方城市為樣板，以外來者的身份和批判的眼光參與北京的新都市建設。但從1924至1935年，這些新知識份子已經開始逐漸適應這個城市，建立了自己的社交網絡和生活習慣，與北京的聯繫加深。1930年代日益密布的戰爭陰霾激發的民族主義思潮使這些新知識份子致力於將中國傳統文化發揚光大，他們開始放下先前對北京本土文化抱持的學者式的疏離感與批判態度，轉向認同北京所代表的「文化」象徵。

而董作斌、陳宗藩等北京本土知識份子則沉溺於帝都時代的風土文化中，堅持在日常生活中尋找碎化的傳統記憶。他們不僅重印了一大批明清時期以北京為題材的文學文本，還創作了大量有關北京記憶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對象徵昔日生活場景的胡同、院落等給予了極大關注。他們認為這些記錄一方面能夠喚起親身經歷者的親密體驗，另一方面也有助於保存傳統。傳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雖然已經不復存在，但並未消逝，而是以殘片的形式四散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及至1930年代在外敵威脅下，新知識份子與生於斯長於斯的北京老派學者合流，均從文化層面認同北京。國民政府「發現傳統」的計劃體現出中國民族主義的兩難困境——民族文化的認同需要及與其劃清界限的必須，也因外敵入侵而得以改變（頁96）。當老北京作為一個文化實體

正在日漸消亡和碎化的同時，關於北京的記憶卻愈來愈明晰，愈來愈堅固。

可以看出，作者一方面秉承了新文化史「眼光向下」的視角，深入以往未曾受到關注的民國北京普通居民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另一方面又將地方政府、新老知識份子納入研究範圍，進而通過多種研究方法對豐富、動態的「回收」圖景作多維闡釋並加以貫穿，為我們展示出知識份子、個體攤販、雜耍藝人等三教九流共同生活其中的城市圖景。

三 研究路徑與資料運用

1960年代以來的美國史學界發生了一種「人類學轉向」，推動史學走向人類學式的歷史學。這種人類學取向不僅推動了新敘事史的發展，也促使歷史學更關注人類學層面的文化事務^⑤。董玥在《民國北京》中不僅大量運用人類學的白描式論述方法以再現民國北京的生活場景，並且從蕭鳳霞、閻雲翔等人類學家的研究中吸取了核心觀點。儘管研究對象各異，但董玥與蕭、閻等人都致力於通過考察生活中的各種儀式化行為，揭示其背後的文化涵義與權力關係，並在其研究中都引入了「回收」概念，將其視作人們在生活中根據當下需要採取各種應對行為，在無意中整合傳統與現代鴻溝的生存策略^⑥。

董玥在認同「回收」概念的基礎上增添了歷史解釋，認為「回收」有

其獨特的發展過程。通過「回收」方式整合到當下的「傳統」，早先是被同樣的「回收」方式整合了更早的「傳統」的「當下」(頁12)。如城市文化史研究者連玲玲所言，董玥此書最大的貢獻是從日常生活的細節中提煉出概念性原則來重新思考中國近代史的重大問題^⑦。「回收」概念的提出使得將城市視作一個整體加以考察成為可能(頁306)。儘管作者對這一概念的定義及論述多少顯得模糊、寬泛、缺乏周延，但它為我們提供了民國北京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對待過去與現在的複雜面相，並且使我們管窺到長期被遮蔽的普通民眾的生活面貌^⑧。

連玲玲指出^⑨：

中國學者對日常生活的關注仍然以現代化為論述中心，目的在於尋找「現代化」的可能，而非挑戰「現代化」的史學典範……而海外中國日常生活史研究多半從二十世紀日常生活的圖像尋找未受帝國主義影響、或即使受西方文化的環伺亦堅持傳統的部分。

同盧漢超、王笛等學者一樣，董玥也旨在探究現代化變遷過程中的傳統部分，並且將目光轉向普通民眾。然而，董玥並未全部聚焦於民眾，而是試圖通過將他們與新老知識份子的日常生活和城市記憶綜合呈現出來，進而提煉出民國北京城市文化的共性特徵，揭示出相較於以往賦予現代化以正面色彩的線性歷史觀較少提及的，從傳統向現代

董玥旨在探究現代化變遷過程中的傳統部分，然而並未將目光全部聚焦於民眾，她試圖通過綜合呈現民眾與新老知識份子的日常生活和城市記憶，進而提煉出民國北京城市文化的共性特徵。

關於民國北京城市空間轉型的分析中看不到地方精英的身影，作者似乎把國家政權與北京地方精英視為一體。事實上1920年代弱勢獨裁的中央政權及其有限的社會控制為地方精英提供了相當的生存空間。

轉型過程中的其他面相。「北京經驗」所體現的現代性的獨特面相，一方面是作為現代化進程中短暫的一個回潮而形成的。在此期間，北京並非是現代化進程反向運動的產物，而只是被置於現代化進程中的次級秩序（相比國民政府致力於打造更為現代化的南京與上海）。另一方面，「北京經驗」的產生也緣於北京失去了國都地位並面臨着戰爭陰霾的特定歷史條件。在「文化古城」安逸閒適的生活背後，時時透露出「危城」所帶來的沉重與動蕩的時代陰影。如魏定熙 (Timothy B. Weston) 所言，《民國北京》揭示出現代性是一種建立在以地方史及社會經濟狀況為依託的多樣化表述方案^⑩。

該書在資料運用上也值得一提。在研究地方史時，一般有四類資料可以利用，即官方文本、大眾傳媒、調查統計以及私人記錄^⑪。《民國北京》所用的史料主要有北京市檔案館館藏市政報告、社會局調查報告及北京地方文獻、民國北京的主要報刊雜誌、市政當局刊印的各種旅遊指南，以及文人知識份子關於北京的回憶文章等。作者運用資料也有所側重。在論述北京城市轉型、生產體系與消費場所的變化時，大量引用北京市政檔案史料，並輔以《北京電車公司檔案史料》、《北平市工商業概況》、《北平娼妓調查》、《天橋商場》等資料彙編，以及《市政評論》等1920、30年代的期刊雜誌；在論述北京居民的日常生活體驗與城市記憶時，除了運用《天橋史話》、《北平史志稿》、《北京歷史人口地理》等地方文史資料

外，主要依靠知識份子有關的文章與回憶錄及《西北風》等期刊雜誌上的相關文章，體現出作者對史料擷取和運用的綜合把握能力。

四 幾點商榷

作為一部開拓性的學術著作，《民國北京》也有值得商榷之處。首先，關於民國北京城市空間轉型的分析中看不到地方精英的身影，作者似乎把國家政權與北京地方精英視為一體。由此作者的結論是：城市居民沒有建立任何形式的社會組織以凝聚他們的利益訴求，博弈發生在國家與孤立的個人或小社區之間；北京城正在通過有軌電車、報紙、新開闢的公共空間等方式變得一體化，但居民卻被相互隔絕（頁76-77）。然而，事實上1920年代弱勢獨裁的中央政權及其有限的社會控制為地方精英提供了相當的生存空間，當長江中下游的地方精英階層在北伐波及下受到普遍衝擊時，華北的地方精英階層仍然保持着相對穩定性。

美國學者史謙德 (David Strand) 對民國時期北京人力車工人的研究認為，1920年代北京的地方精英扮演着政治調適者的角色，當其自身利益與民眾利益相一致時，他們能夠以民眾代言人的身份與上層權威斡旋，而當民眾威脅到他們的利益時，他們也能夠對其採取壓制態度^⑫。無論是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羅威廉 (William T. Rowe) 等海外學者抑或王先明、魏光奇等

國內學者對近代中國地方精英的考察均表明，地方精英不僅在晚清與民國時期積極參與地方社會的公共事務，且有着強烈的參政意識與獨特的政治訴求^⑥。因此，儘管董玥注意到史謙德的已有研究並認為自己所關注的對象與之不同（頁8），但北京地方精英作為一個群體不能被忽視。由此帶來的問題是，如何認識民國北京的地方精英？民國時期的北京地方精英是否曾經作為一種具有自身獨特利益訴求的社會階層而呈現？

其次，董玥在書中通過天橋呈現民國北京居民的日常生活經驗，但必須看到，天橋本身是以非日常性的特徵存在的，民國北京的普通居民並不會將天橋看作其日常生活中「回收」策略運用的主要空間。當下層民眾將散落在胡同、街道等各個角落的挑擔叫賣者及二手集市作為日常生活主要光顧的對象及場所時，上層居民則選擇商場、百貨大樓等新式消費場所。天橋，更主要是一個不同社會階層打發閒暇時光的娛樂場所。那麼，這個以非日常性為主要特徵的天橋呈現出的「回收」策略，如何得以代表民國北京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經驗？在這一點上，或許可以說，天橋只是呈現出民國北京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經驗的一個面相。

再次，董玥筆下的天橋似乎是一個旨在消弭社會階層分化的象徵，不同社會階層通過在天橋的個人體驗，局部地顛覆了現存的社會等級與身份差異。然而必須看到，相比於1920年代時局動蕩引發各社

會階層間的非正常流動，1930年代的中國社會開始逐漸秩序化、分層化與穩定化。這種階層分化同樣可以在天橋這個特定空間體現出來。天橋這種二手商品的加工與交易集散地在許多城市中都存在。中下層居民在這裏購買從富人家庭流出的二手物品、衣帽服飾，追隨着由富人引領的消費風潮。對中下層百姓而言，天橋是吃穿住用等日常生計的源頭；而文人知識份子則在天橋管窺百態世相。倘若作者引入消費文化與身份認同等理論，進一步考察不同社會階層前往天橋的頻次、關於天橋的論述及其在天橋的消費方式，揭示民國北京的「消費品味」如何被建構出來，或許可以更精彩地呈現出民國北京的文化風貌與社會分層的深層面相。

當1930年代的民族危機日益籠罩北京時，天橋逐漸成為一個具有政治色彩的公共空間。激進的學生群體走出校門，在天橋、前門等鬧市區發表演講，抗議政府的不作為，動員民眾。政府則在相關地點布置軍警，力圖扼殺勃勃興起的遊行運動。通過分析學生、市民、軍警等不同勢力在天橋的衝突角力，展現天橋從平民市場轉變為政治性公共空間的過程，有利於從微觀層面考察1930年代政治對社會生活的滲透。

儘管董玥從細微瑣碎的日常生活論述中提煉出「回收」這一概念，並將其上升至民國北京的城市文化特徵，但無法避免經驗描述與理論概括之間的悖論。城市文化的特性歸根結底在於地方性，但過於貼近

以非日常性為主要特徵的天橋呈現出的「回收」策略，如何得以代表民國北京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經驗？或許可以說，天橋只是呈現出民國北京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經驗的一個面相。

城市文化的特性歸根結底在於地方性，將一種基於地方性的經驗描述概括為具有普遍意義的特徵時，如何化解特殊性與普遍性之間的矛盾，是研究者需要面對的首要問題。

經驗的書寫，對於沒有同樣經驗的人便會產生理解上的困難^④。因此，將一種基於地方性的經驗描述概括為具有普遍意義的特徵時，如何化解特殊性與普遍性之間的矛盾，是研究者需要面對的首要問題。毋庸置疑，民國時期北京具有獨特的城市文化風格，但類似在天橋上從事的以二手物品加工與交易為主要內容的「回收」過程又是否民國北京的獨特現象？倘或是，又該如何解讀與之類似的民國時期上海城隍廟及南市的二手商品交易市場？倘或不是，又何以論證該現象為民國北京獨特的城市文化特徵，並如作者所言，將其與「懷舊」相聯繫，進而提升為中國現代性的精髓（頁303）？此外，作者在論及北京老派學者日常生活中的懷舊時，已經將其與巴黎作了對比，而在結論部分又將此論述加以重複，難免給人以贅述之嫌（頁265）。

作為一部城市史研究專著，《民國北京》以城市公共空間為場域，考察民眾與政權之間的互動互滲如何圍繞着具體的空間展開，是目前史學界在空間政治方面的主要研究方法。空間政治研究打破馬克思主義將衝突放置在特定生產關係與生產力塑造的社會階級結構內的窠臼，透過微觀世界展示的互動博弈，賦予研究對象以歷史主體性。然而，儘管該研究路徑以精細的層層剝析呈現歷史細節的多樣性，但卻難以提煉出對處於支配地位的社會結構論具有顛覆性的理論回應，從而只能作為社會結構論與階級分析論的局部修正，並面臨自身問題

意識的窄化與模糊化趨勢。空間政治研究的根本，在於把握不同社會階層發生在特定空間裏的互動衝突背後所隱藏的權力關係。要拓寬從空間政治視角切入的城市史研究，還需深入考察各階層博弈策略的文化意涵與儀式象徵，將形塑特定社會風貌及城市特徵的文化因素考慮在內。

綜上，儘管《民國北京》仍然有值得商榷及深入探究之處，但作者在書中嫻熟運用政治史、文化史等多種研究方法，用日常生活視角加以結合，並提煉出「回收」與「懷舊」兩個關聯主題駕馭全書，是該書最主要的特色。美國地理學者哈維（David Harvey）認為，儘管資本主義全球流動加速了空間障礙的消解，一方面使得地方感逐漸消失且與歷史脫節，但另一方面也造成許多地方同時進入競爭，愈有特色的地方就愈具備吸引全球性資本的競爭力^⑤。王德威也指出：比起上海，北京因為缺乏可以借鏡的現成理論模式，所凸現的現代性經驗反而更為複雜；如果說上海的現代意義來自於其無中生有的都會奇觀，以及近代西方文明交錯的影響，北京的現代意義則來自於它所積澱、並列的歷史想像與律動^⑥。相較於伴隨全球化進程而來的以普世文明為其城市象徵的上海，民國北京正是以其地方性而受到青睞。如何能夠不隨時代發展的浪潮之波肆意逐流，構建一種以人為本、屬於城市自身的生活方式，或許是讀罷此書令人掩卷遐思的問題。

註釋

① 盧漢超：〈美國的中國城市史研究〉，《清華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頁120。

② 參見Peter Burke,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Aldershot, Hants: Scholar Press, 1994)。

③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視野、角度與方法》(北京：三聯書店，2005)，頁12。

④ 趙靜蓉：〈懷舊文化事件的社會學分析〉，《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3期，頁183。

⑤ 張小軍：〈史學的人類學化和人類學的歷史化——兼論被史學「搶注」的歷史人類學〉，《歷史人類學學刊》，2003年第1卷第1期，頁2-3。

⑥ 參見Helen Siu, "Recycling Rituals", in *Unofficial China: Popular Culture and Though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ed. Perry Link, Richard Madsen, and Paul G. Pickowicz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9), 132-34; Yunxiang Yan, *The Flow of Gifts: 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38。需要指出的是，在高家龍(Sherman Cochran)關於近代中國企業史的研究中，也有類似看法，只是不用「回收」一詞。他認為近代中國商人儘管深受傳統影響，但並不固守傳統，同時他們也不遺餘力吸收現代技術，他們所選擇的傳統與現代因素皆被視為企業經營的文化資本。引自連玲玲：〈典範抑或危機？「日常生活」在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應用及其問題〉，《新史學》，2006年第17卷第4期，頁276。

⑦⑧ 連玲玲：〈典範抑或危機？〉，頁276；276-78。

⑨ Michael Tsing, "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 *The China Review* 7, no. 1 (2007): 155.

⑩ 參見Timothy B. Weston, "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 July 2007, <http://mclc.osu.edu/rc/pubs/reviews/weston.htm>.

⑪ 王笛著，李德英、謝繼華譯：《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頁7。

⑫ 參見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⑬ 目前學界通常認為從晚清到民國，地方精英發生了變化。晚清地方精英主要依賴於其地域社會的關係紐帶，而民國時期的新式地方精英更多依託國家行政參與和主導地方公共事務。參見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羅威廉(William T. Rowe)著，魯西奇、羅杜芳譯：《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衝突和社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王先明：《近代紳士：一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魏光奇：《官治與自治：20世紀上半期的中國縣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⑭ 參見孫瑞穗：〈失敗者的共同體想像：回應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思想》，2009年第13期，頁137。

⑮ 引自范銘茹：《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8)，頁22。

⑯ 王德威：〈序二〉，載陳平原、王德威主編：《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2。